

托派鲁迅论的政党政治思维及局限

——《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中的几个问题

徐纪阳

内容提要 一丁的《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是1978年在香港出版的一本系统阐述鲁迅的著作，该书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宏观背景下，从中国共产党党内路线斗争的角度对“左联五烈士”这一提法、“两个口号”论争中鲁迅的立场、鲁迅与托洛茨基的思想关联以及毛泽东的鲁迅论等问题作出了独具特色的解释。但一丁的鲁迅论因文学视野的缺失和托派史观的限制而带有明显的局限。该书虽是个人之作，却因其清晰可辨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思维方式，代表着托派鲁迅观的一般形态，是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和精神文化现象。它展现了鲁迅思想在特殊政治文化层面的历史影响，丰富了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由鲁迅衍生的文化现象。

关键词 托派；鲁迅；一丁；左联五烈士；“两个口号”论争

—

托派的鲁迅论长期未得到大陆学界关注，其中有着特殊而复杂的原因。托派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很有“敌意”的一个概念。中国托派是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权力斗争的背景下产生的。在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上，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有巨大的分歧，斯大林主张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而托洛茨基则坚决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一群留苏归国的左翼青年和国内的部分共产党干部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开始中国的托派运动。这批托洛茨基主义者后来被开除出党，以中国共产党“反对派”的面目出现，同时也反对国民党。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僵化的教条，坚持“城市中心”和“阶级斗争绝对化”理论，反对中国共产党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坚持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主张只依靠工人阶级，通过发动城市工人武装暴动夺取全国政权，建立剥夺一切资产阶级（包括农民小私有者）财产的无产阶级专政。由于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路线上

的这种分歧，中国托派长期被定性为“汉奸”“反革命”。毛泽东在1937年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就把中国托派和“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汉奸、亲日派”并列。但是，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对上述说法作了新的注释：

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1]

这条注释，纠正了长期以来的“托派汉奸论”的说法。在此之前唐宝林也在《中共党史研究》上撰文指出，中国托派历来坚持反帝国主义侵略、反国民党独裁统治，尽管其革命路线是错误的，但还是应将其“视为革命阵营内部极左的宗派小集团”，而且党在与其斗争的同时也并未放弃对他们的争取工作^[2]。因此，今天来谈托派的鲁迅论不应被视为禁忌。

20世纪30年代，中国托派曾与鲁迅有过交集。“两个口号”论争中，鲁迅反对周扬等人提出的

“国防文学”，坚持在统一战线中保持阶级的自主性，提出兼顾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在当时复杂的情况下，托派误认为鲁迅的基本精神和托派反对统一战线、坚持阶级斗争的立场是一致的。因此，托派成员陈其昌化名陈仲山致信鲁迅，攻击斯大林和中国共产党，并阐述托派对于中国革命的观点，希望取得鲁迅对托派的支持。在冯雪峰的提议下，病中的鲁迅委托冯雪峰代为拟稿公开答复陈其昌，这就是后来不断引发学界争议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3]。后来，王凡西、郑超麟等托派成员都对此事发表过评论。比如王凡西就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党内路线分歧的角度呈现了事件的全过程，在政党政治的层面指出鲁迅与周扬论争的背景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并且将鲁迅定性为共产党的“同路人”而非共产主义者^[4]，这符合托派的思维特征。

上述问题研究者甚众。但另一个托派成员一丁较为系统的鲁迅论却极少为学术界所关注。一丁原名楼国华（1906—1995），另有笔名子春、少垣、则诚等，浙江余姚人，作家楼适夷堂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接受托洛茨基主义后开始从事托派活动，1949年离沪赴港，先后出版了十多本相关著作。其代表作《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1978年在香港出版，是一本从托派立场系统阐述鲁迅的著作，其中对30年代文坛围绕鲁迅而发生的一些事件的考察尤其值得注意。

《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出版前，书中文章曾陆续发表于香港的报刊，全书分为“长篇”和“短篇”两个部分。其中“短篇”部分，是1958—1974年间所写的30篇关于鲁迅的短文。“长篇”写于1972年，连载于当年的《南北极》杂志。该书在发表到第六章言及辛亥革命前后的鲁迅时，受到读者来信的批评：“请恕小子眼拙，至今仍不知道一丁先生对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有何独特见解，我手边有曹聚仁的《鲁迅评传》《鲁迅年谱》，远比一丁先生高明多了。”^[5]李欧梵也表示该书“并无新意”，而此时编辑也不再尊一丁为“鲁迅专家”了^[6]。鉴于此，在1972年11月刊载了《鲁迅与章太炎——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之七》之后，一丁便主动撤稿。于是，全文要等到1978年9月

《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的出版才与世人见面。客观地说，该书的前半部分叙述鲁迅生平，与曹聚仁的《鲁迅年谱》《鲁迅评传》相比确实了无新意，但其贡献在于后半部分对鲁迅后期思想和文化活动的研究。书中披露的一些鲜为人知（或长期被遮蔽）的历史细节，对于全面了解20世纪30年代文坛论争有重要的价值。尤其是一丁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党内路线分歧等角度处理鲁迅与中国革命、鲁迅与托洛茨基文艺思想的关系等问题，率先提示出鲁迅后期思想研究的新的可能性，其中一些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极具学术价值。

二

一丁早年曾参加革命，对当时革命团体的组织结构、运作方式、人事关系等非常熟悉，尤其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背景下观察中国革命的独特视角，使得他对一些问题的理解超出一般的认识。

比如，1931年2月被国民党杀害的柔石、胡也频、殷夫、李伟森（李求实）、冯铿等5位共产党员一直被称为“左联五烈士”。但是一丁认为，“左联五烈士”的说法传达了“似乎这五个作家为左联牺牲的”^[7]的错误信息，遮蔽了事件的真相。他指出柔石等5人并非在左联的活动中遇难，而是在党的政治活动中与其他18人一起被捕杀的，所以此案应称为“何孟雄案”，而非“左联五烈士案”。为了说明事件的原委，一丁采用了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张国焘《我的回忆》及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等三种文献相互印证。

他首先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为依据，指出1930年前后党内存在着路线斗争，即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上以反“立三路线”、反“调和路线”为旗帜，在政治纲领上仍实施“反右倾”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从而间接导致了李求实、林育南等人的遇难。“决议”对包含“左联五烈士”在内的牺牲的23位共产党员有积极、正面的评价：“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

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8]一丁援引“决议”的内容，显然是想借此证明党的历史文件也是从政治斗争而非文化活动的层面来评价他们的牺牲的。

接着一丁援引张国焘的回忆录，披露了更具体的细节：“何孟雄任过上海区委书记，他与担任重要宣传工作的林育南及任少共中央常委的李求实等十七个重要干部，因反对米夫派陈绍禹等，假东方旅馆一个房间，秘密集会，竟全体被捕，这件事震动一时。”^[9]张国焘这里提及的党内路线斗争，在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中则追溯到更早的1928年江苏省委与斯大林路线之间的矛盾。在王凡西看来，江苏省委所领导的这些革命家是反对斯大林主义影响下的“立三路线”、瞿秋白“盲动主义”及后来的“王明路线”的主要力量。王凡西对事件有如下的说明：

可是陈派（笔者按：陈指陈绍禹，即王明）一经上台……凭他原有的国际靠山，加上了新得的党内权势，发动了非常猛烈的“反右派”攻击。这是一场上压下的打，一切优势操在陈绍禹们手里；但“右派”（同时又被称为“调和派”）……仍英勇抵抗，甚至不惜组织第二党来贯彻主张呢。可是不幸得很，当第一次该派主要领袖们在先施公司后面的东方旅馆辟室会议之时，突被龙华派来的警探捕去……遂遭蒋介石屠杀于龙华机场。二十余位烈士中有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10]

一丁援引的这段话传递了两个信息：首先，此案中牺牲者共二十余人，并非仅为5人；其次，事件是由党内的宗派斗争引发的。据此，一丁得出结论：“似乎这五个作家为左联牺牲的，其实完全不是。他们的死，死于共产党的内部斗争，死于江苏省委反对王明一系篡夺党权的斗争；他们的死，应该说是由于他们是共产党，而不是由于他们是作家，是左联成员。”^[11]

上述论证逻辑严谨。首先，从中共中央的文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可以确认党内确实存在着路线分歧，以及这种分歧与“何孟雄案”的关系。而张国焘和王凡西不仅明确指出“何孟雄案”是党内斗争所致，还进一步认为此案的发生是“王

明派”的告密所致——一丁并未采信这一说法，但也没有否定，体现了审慎的态度。这三种文献的立场各不相同，但三方的叙述不仅没有明显的矛盾，反而呈现出相当的一致性，因此可推论基本事实是成立的，即李伟森等5人不是因为参加左联的文学活动、而是参加党的活动遭到捕杀的。客观地看，左联是党领导下的一个文学组织，其成立仰仗并受制于党的人事网络，内部也设有党的组织“党团”。但作为一个文学团体，其组织形态与活动方式都不是政党性的，尤其是其中还有不少为左翼文化所吸引的非党员成员，所以左联不应被视为党的组织的一部分，只能算是党的外围组织。因此，在5位共产党员因参加党内集会、讨论党的路线问题而被捕，且其中可能只有4位是左联成员的情况下^[12]，自然不能认为他们是为左联而牺牲。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丁认为柔石等人死于党内路线斗争而非由于从事左联活动，是更符合历史事实的说法。

2007年，朱正将此事作为“党史上的一个‘秘密’”，在大陆学界首次提出：所谓左联五烈士“并不是在‘左联’活动中被捕，也不是以左翼作家的身份被杀的”，“他们是中共一场党内斗争的牺牲者”，他们的被捕是由于出席一次“反对四中全会的党内会议”，为王明指使的内奸或顾顺章告密所致^[13]。朱正以《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潘汉年非凡的一生》等文献为依据，得出了与一丁相同的观点，可以说是殊途同归。然而，这距离一丁公开发表他的观点，已将近30年了。

一丁早年入党，经历过党内斗争及托派从中国共产党分离出来的过程，对当时革命中的路线分歧及相关历史细节有着切身的经验；同时，由于受托洛茨基视文艺与政治为相对独立的两个领域的文艺观的影响，一丁将革命性的文学活动与革命性的政治活动做了严格的区分。这使得一丁能够重新考释“左联五烈士”这一概念，在中国革命路线分歧的历史脉络中披露柔石等人牺牲的真实原因。

三

一丁认为，柔石等人遇难后，“鲁迅伤痛之深且久”，和他后来与胡风、冯雪峰、瞿秋白等人交

往的经验相叠加，带来他对中国共产党党内路线斗争的“深切体会”，“鲁迅后来公然与王明的文艺路线（国防文学）为敌，主要由于以上的种种认识”^[14]。但这并不是私人的恩怨：“鲁迅与左联的龃龉，看似个人问题，实际上是领导问题，最后则完全是政策和路线问题。”^[15]一丁在政党政治的脉络中突出鲁迅在“两个口号”论争中与各方不同的立场，是相当超前的研究。

新世纪以来，学界大多讨论《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在多大程度上代表鲁迅的本意。有学者认为这两篇文章是鲁迅真实意愿的表达，进而提出鲁迅晚年与毛泽东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立场一致的观点^[16]。有学者则从上述二文不符合鲁迅对托洛茨基文艺思想的一贯推崇、不符合鲁迅坚持的“辱骂和恐吓不是战斗”的原则及鲁迅不拟将此二文收入自己的文集等方面，论证这两篇文章不能代表鲁迅的意见，甚至应将其从《鲁迅全集》中删去^[17]。另有学者指出“两个口号”的论争表面是“周扬派”与“鲁迅派”两方面的论争，实际上却是“周扬派”“鲁迅派”和托派三方面的交锋，只有将托派引入论争的整体格局中，才能理解这场论争的政治复杂性^[18]。加入托派固然可以呈现更多的复杂性，但“鲁迅派”的提法却又模糊了鲁迅和冯雪峰及其所代表的毛泽东在立场上的差异。“先生口授，O.V.笔写”的内在矛盾，仍然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对此，一丁早就有如下见解：冯雪峰“为了政治利益，当托派给鲁迅信时，的确在鲁迅病中，影响他用生平最嫌恶的卢布说去诬蔑托派，以此掩盖鲁迅对共产党改变政治路线的反对意义”^[19]，“但不论O·V（雪峰）能给他多少影响，这封信总是鲁迅本人认可的”^[20]。一丁既承认辱骂和恐吓不是鲁迅的话语，而是冯雪峰借鲁迅之名来反对托派，同时也不否认这两篇文章代表鲁迅对延安路线的某种认可，揭示了鲁迅与冯雪峰是异中求同的合作关系，而非立场的完全一致。鲁迅和冯雪峰一是思想革命立场上的思想家，一是政治革命立场上的革命者。正如王富仁后来指出的：冯雪峰承认鲁迅思想的独立性，并积极争取他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同时冯雪峰还要争取中共领导人对鲁

迅的了解和尊重；而对鲁迅来说，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思考与毛泽东路线有某种一致，因此他也愿意尽可能地满足冯雪峰所代表的延安方面的愿望和要求^[21]。但冯雪峰作为鲁迅与中共中央之间的联系人，主要还是代表中共中央的立场。如此一来，就不能因冯雪峰和鲁迅“合写”文章而认为鲁迅和冯雪峰（以及他所代表的毛泽东）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也就不能将冯雪峰简单视为“鲁迅派”了。

周扬等人所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在一丁看来，乃是斯大林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延伸，其中所贯彻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是对文艺斗争领域的阶级性的取消。一丁认为鲁迅对此的态度是，他“憎恶借抗日之名第二次企图投降国民党的、在共产党中颇为得势的周扬之流——周扬后面站着米夫、王明一系，米夫、王明背后站着从‘第三时期’走到‘联合阵线’的史大林”^[22]。在托派的视野中，中国共产党党内莫斯科路线（王明）和延安路线（毛泽东）之间的分歧显而易见。1935年年底，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视蒋介石为中国革命的最主要敌人之一，“决议”明确指出党的策略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23]。即使后来毛泽东的表述有所调整，也仍然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以“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共产党的独立性”为前提^[24]。这与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是截然不同的。毛泽东与王明的差别并不在于要不要统一战线，而在于如何建立以及建立什么样的统一战线。

由于失去战友的伤痛，当周扬等人遵从王明的指示解散左联，另组“中国文艺家协会”，提倡“国防文学”时，鲁迅自然抵触其中对阶级立场的放弃：“也要联合国民党，那些先前投敌的分子，是最欢迎的了。”^[25]“我确是不容易改变。就算记住敌人的仇恨是一种错误罢，也就只好错误了……不念旧恶，甚么话！”^[26]一丁将鲁迅的立场总结为：“表面上，鲁迅是赞成抗日统一战线的，而且也不一定反对‘国防文学’，实质上，他彻底反对

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投降政策，绝不妥协。”^[27]他认为，虽然鲁迅未必了解党内的路线斗争，但即使从个人经验出发，他仍然会反对王明路线（在文艺领域以周扬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为代表），在这方面，鲁迅的思路与毛泽东的路线接近，即拥护统一战线，但同时也不放弃对国民党的斗争而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一丁指出，冯雪峰与鲁迅的合作所遵循的路线，与后来中共党史上关于毛泽东路线和王明路线的斗争的结论是一致的。不过，一丁仍然强调鲁迅的思想并不来自于政党政治的启示：“即使有冯雪峰从瓦窑堡带来的指示，他对于两个口号之间的斗争，还是由于他一生对黑暗势力斗争的经验而来，而不是基于一个革命政党的策略改变。”^[28]这实际上指出鲁迅是在个人经验和情感层面反对“联合战线”，而非在政党政治的逻辑中。

一丁的结论在今天看来并不新颖。但他率先打开了从党内路线分歧的角度研究鲁迅的视野，在方法论上有着特殊的价值。1980年代以来，随着新的文献资料的陆续出现^[29]，大陆学界对“两个口号”论争不断有新的阐释，不过基本观点仍未超出一丁当年的结论。

四

一丁的鲁迅论是在与其他人的鲁迅论的区别中显示出价值的。在近现代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脉络中理解鲁迅，对其思想作阶级的分析，这并非左翼的专利。郑学稼的《鲁迅正传》^[30]也有阶级论的特征，但基本立场是右翼的。郑学稼对鲁迅毁誉参半，以文学性肯定前期鲁迅而以阶级性否定后期鲁迅，并且从人格上攻击鲁迅“自私和作伪”。一丁也以近代史为背景对鲁迅进行阶级论的分析，但他并不同意郑学稼关于鲁迅的论断。相反，他对晚年鲁迅从思想上“信从了阶级论”有极高的评价，呈现出相当鲜明的左翼特征。一丁指出，鲁迅一生思想和行动以加入左联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31]，前期的“鲁迅只是一个资产阶级性的左翼改革者”，后期的鲁迅背叛了“这熟识的本阶级”，“改变了他自己的阶级意识”^[32]。这接近瞿秋白的思路，但在论及鲁迅的“阶级意识”与其思想立场的关系

时，一丁又和瞿秋白不同。究其原因，二者一在列宁主义的轨道上，一在托洛茨基主义的思路中。

瞿秋白以其经典论述，向世人表明鲁迅在晚年成为革命阵营的一员：“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 and 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33]瞿秋白在列宁主义的话语体系中概括鲁迅的价值，忽略鲁迅后期思想与前期思想的关联。一丁则受托洛茨基评价俄国“同路人”作家的启发，视鲁迅为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注意到他和旧文化的无法割断的联系。一丁指出，“鲁迅始终是站在革命门外的人”^[34]，他“不追随向左的陈独秀李大钊，却轻视向右的胡适”，毕生所投入的是思想革命的事业，并不简单地投向政治革命，而是将政治革命内化于思想革命之中^[35]。基于托洛茨基主义的思路，一丁注意到鲁迅与政党文化的分歧，不将鲁迅看作政治革命家：

鲁迅有他的时代，而且也属于他一定的阶级；时代和阶级当然不只是消极地作为他生活的一种背景。他对于那个时代，那个阶级，都主动地积极地予以反应，抨击，甚至背叛；但如果称他为革命家，中国文化革命的前驱，与李大钊相提并论，这种与事实显然不符的纸糊冠他一定敬谢不敏。^[36]

一丁认为鲁迅思想的根本在于他从情感上对弱小者的关怀，而不是政治革命层面的认识：“俄国的1905年革命，影响了鲁迅，使他同情东欧的被压迫民族……鲁迅虽然从消极转到积极，但他并未积极到成为共产党员，得经过更多的道路，他才放弃他的进化论，接受了阶级斗争论。”^[37]“他虽然信从了阶级论，思想上始终不是马克思主义者。”^[38]革命对鲁迅来说是一种情感体验而非政治认识，所以他没有成为政治家，而始终保持着作家的身份，“后来虽然成为共产党的‘同路人’，却始终没有失却作为他个人的轴心，他保持这个轴心，所以能够在死前反对共产党联合阵线的投降政策”^[39]。一丁的鲁迅论虽然带有左翼的色彩，却主要在托洛茨基的思路和托派的立场上展开，这不

同于瞿秋白在列宁主义的逻辑中对鲁迅的认识。

在一丁看来,鲁迅在1932年之前屡屡援引托洛茨基,是为其理论所吸引的结果,在并不了解当时苏联内部因中国革命而引发的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争的情况下,鲁迅对于“没落”了的托洛茨基并不加以奚落和嘲笑,即使在1932年之后,鲁迅已很少提及托洛茨基,但他仍认同其文艺观。1932年,当瞿秋白翻译了别德纳衣的长诗《没功夫唾骂》,引发芸生(邱九如)以一首戏仿之作《汉奸的供状》批评胡秋原时,鲁迅表达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意见。这当然并非一丁所认为的是“鲁迅用间接的批评,反对对于托洛茨基的无耻诬蔑”^[40]那么简单,因为“鲁迅对托洛茨基的接受,和托派对托洛茨基的崇拜是有差异的”^[41]。但这种借鲁迅为托派辩护,以论证托派路线合理性的努力,在客观上使得鲁迅思想的歧义性和丰富性得以呈现。

一丁注意到鲁迅接受苏联文艺思想的复杂语境,指出其所译的《文艺政策》“是苏联文学论争的结集,有各派不同的意见,主要的脉络,也可以说是主张‘无产阶级文学’的一派与托洛茨基一派的对立”^[42]。因此,鲁迅是在相互对立的两面中接受托洛茨基文艺观的。孙郁曾指出:五四之后,关于苏联问题的争论主要表现在艺术层面和政党层面;“在艺术领域,鲁迅对革命文学的阐述基本是沿着托洛茨基的逻辑前行的”,而在政党层面,“斯大林主义与托洛茨基思想的交锋在中国也异常激烈地表现出来”^[43]。但在一丁这里,艺术问题被纳入到政党斗争的脉络中,情况就更为复杂。在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下,托派习惯于把中国共产党党内关于革命路线的分歧视为共产国际内部矛盾的延长。这样一来,鲁迅与左联领导人的矛盾,在一丁的语境中就转换成鲁迅所受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和左联领导人所贯彻的斯大林主义的冲突,是鲁迅以从托洛茨基那里接受的非强制主义的革命理论对周扬等人的专断主义的反抗。在“两个口号”论争中,周扬一派以“正统”自居、不容异见的独断论思维方式,表明左联领导人是在政治革命的逻辑中思考文学的问题,因而以政治统领文学、对文学行指导之责,是革命逻辑的必然要求。但对鲁迅而言,文学不

能成为政治意识的附属,更不能接受政治的领导。鲁迅在译完《文艺政策》一书后曾表示:“文艺应否受党的严紧的指导的问题……看去虽然简单,但倘以文艺为政治斗争的一翼的时候,是很不容易解决的。”^[44]一丁在引用鲁迅这句话之后,提出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并将后来多次发生在文学领域的大批判运动的主要原因都归结于“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因此,一丁对“两个口号”论争的分析尽管带有宗派主义和个人恩怨的色彩,但他还是确认双方的根本分歧在思想层面,即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有不同理解,而鲁迅对这一关系的理解,又是和托洛茨基的影响分不开的。一丁的思路超前于他的时代,在此后的很长时期,中国大陆学界一直否认鲁迅思想与托洛茨基主义的关联,直到近十多年来,因受日本学者长堀祐造的启发,相关研究才逐渐深化^[45]。

五

毛泽东“征用”鲁迅进行意识形态的建构,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建设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形成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一丁却认为毛泽东的鲁迅论是对鲁迅精神的“阉割”。鲁迅关于“统一战线”的观点与毛泽东的政治立场接近,但鲁迅对于文学的独立性的坚持,却在毛泽东文艺思想中被政治性所消解,一丁视此为斯大林主义在毛泽东文艺思想中的延伸:自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文艺作家所走的路,无一不是鲁迅早已指出过的那条歧途,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的文艺政策,只是不断地把那些不满意的文艺家排轧出去,所谓文艺,只有《两个太阳颂》之类容许存在”^[46]。

在一丁看来,鲁迅视文艺与政治为相互独立的领域,这“预先反驳了将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标准,即‘党的文艺工作……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那种见解”,“在史大林与毛泽东的文艺政策中,鲁迅笔法,鲁迅作风,鲁迅精神都是应该打倒的,延安座谈会上,毛泽东就有此表示,而事实上,承袭了鲁迅笔法、作风、精神的文学家,以后也无一不

被清算了，这都是由于毛泽东认为文艺只可尽宣传的作用，不可能有独立的存在”^[47]。如果考虑到托洛茨基主张文学作品有批判的自由，强调作家在支持革命的前提下内心精神自由的重要性，斥责政治对文艺的过度干涉，那么可以说，一丁对毛泽东鲁迅论的评价是完全遵循着托洛茨基的观点而来的。

毛泽东后来仍然重用曾代表“王明路线”的周扬为党的文艺的领导者，在一丁看来同样是斯大林式的专断主义使然：“王明与毛泽东虽有分歧，在总方向上两者还是具有共同点的，他们都是史大林主义者，所以即使在一九四五年之后，王明一系彻底的失败了，主宰共产党文艺路线的，仍是当年王明的拥护者周扬其人，官僚主义的专断与独尊，需要软脊骨的人阿谀奉迎，这是路线择人，与个人爱憎无关的。”^[48]一丁的解释固然有其合理性，但毛泽东“征用”鲁迅所内含的政党文化建设这一核心诉求，却被忽略了。毛泽东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基本观点，确实是和周扬相同而和鲁迅背道而驰的，他看到周扬坚持文艺服从于政治的逻辑，和他本人在政治范畴中处理文艺问题的思路一致——这才是毛泽东后来重用周扬的深层原因。1938年，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指出：“今天第一条是一切爱国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条才是我们自己艺术上的政治立场……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这就是鲁迅先生的方向。”^[49]在这里，毛泽东剔除了鲁迅思想中来自托洛茨基的文学与政治相对独立的思想，而只保留了鲁迅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性的立场。这正与当年左联在接受鲁迅思想的时候，“保留了对革命文化期待的部分，剔除了个性的价值形态”^[50]的逻辑是一致的。强调“艺术上的政治立场”，表明毛泽东在处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时，政治占据着主导地位。

尽管鲁迅和毛泽东在“统一战线”的问题上有相近的思考，但二者的出发点和旨归并不相同。鲁迅在思想启蒙的层面看问题，毛泽东在政党文化建设上着力，因此既不能以革命家的标准来要求文学家，也不能以文学家的标准来要求革命家。但一丁却一面在政党政治的思路中批评鲁迅死前势利地投靠了共产党，另一面又在文艺内部的逻辑中批评毛泽东对鲁迅的“利用”。他的政治思维，还不能跳

脱人事纠纷和宗派主义，没有政党文化建设的内在驱动；他的文学思维，是托洛茨基文艺观的教条式搬用，不承认文学也有参与政治的可能性。一丁的托派视野限制了他对上述问题作清晰的区分。

事实上，毛泽东从1936年开始的对鲁迅的关注和“征用”，既有解决当前迫切政治问题的需要，也与其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证的长期目标相关。短期来看，毛泽东需要通过党内路线斗争在外部为共产党的发展赢得时间，与国民党的合作也是当时形势的需要；长期来看，建立“统一战线”不是放弃自主性，而是要在与国民党的合作中，推进共产党作为一种独立的革命力量的发展与壮大。因此，毛泽东“征用”鲁迅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推动“统一战线”的建立，更包含着建构革命话语的长远政治文化诉求，即建设具有体系性的新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但由于受制于托派的组织基因和组织文化，一丁将毛泽东援引鲁迅进行政党文化建设仅仅理解为是对鲁迅的“利用”，这既是一丁个人的局限，同时也是托派的局限。历史地看，托派虽然有党派斗争的经验，却从未有过成熟的、自主的政党文化，这种缺陷限制了一丁从政党文化建设的高度来理解毛泽东对鲁迅的阐释。上世纪20年代以来，托派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不根据形势的变化作相应的调整，反而死守教条，将托洛茨基主义作为列宁主义之后永远正确的指导思想，这表明他们思想上的僵化。另一方面，托派是从中国共产党分裂出来的组织，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分裂为不同的派别，这种天生的组织基因决定了他们惯于从“分歧”的视野看问题，必然使他们无限放大革命道路探索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分歧，并将之夸大为不可调和的矛盾。

至此，我们可以说，一丁的《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虽是个人之作，却因其清晰可辨的托洛茨基主义思维方式，代表着托派鲁迅观的一般形态，是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和精神文化现象。它展现了鲁迅思想在特殊政治文化层面的历史影响力和现实可能性，丰富了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由鲁迅衍生的文化现象。早年的革命经历使一丁能够从人事纷争和党内路线斗争角度辨析鲁迅与30年代左翼文坛的复杂关系，重新考辨“左联五烈士”的说

法,确认“两个口号”论争中鲁迅的立场;他注意到鲁迅与托洛茨基的思想关联,试图从托洛茨基的文艺观来理解鲁迅和政党文化的分歧,解释鲁迅的行动、思想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他虽进入到政党政治的层面,却受限于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资源,自我封闭于托洛茨基政治主张的逻辑中,无法从政党文化建设的高度理解毛泽东的鲁迅论。一丁的鲁迅论当然有其局限,却不失为鲁迅研究史上的重要现象。因此,与其简单地指责一丁的鲁迅研究“大部分观点均荒谬”^[51],不如对这背后特定的政治、文化立场以及阐释者的个性色彩作出合乎历史理性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托派的鲁迅论存在着何种思想局限或政治错误,它都不应该是鲁迅研究者回避的对象。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1批面上一等资助项目“鲁迅香港传播的史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017M61013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2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0页,第25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 唐宝林:《简论中国托派》,《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

[3] 尽管这封信发表时注明“由先生口授,O.V.笔写”(O.V.即冯雪峰),但实际是由冯雪峰拟稿的。

[4]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第190—191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5] 辛汉:《读者与作者》,《南北极》第27期,1972年8月。

[6][7][8][9][10][11][14][15][19][20][22]

[27][28][31][32][34][35][36][37][38][39]

[40][42][46][47][48] 一丁:《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封底,第198页,第199页,第200页,第202—203页,第198页,第204—205页,第231页,第232页,第289页,第153页,第341页,第241页,第188页,第153页,第2页,第147页,第1页,第82页,第288页,第309页,第287页,第285页,第182页,第189页,第205页,巴黎第七大学东亚出版中心1978年版。

[12] 有学者认为李伟森不是左联成员。如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二)》(第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就明确声称“李伟森不是‘左联’成员”。

[13] 朱正:《一个人的呐喊——鲁迅1881—1936》,第268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16] 蒋洪生:《关于鲁迅与托派关系的一桩公案》,《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年第5期。

[17] 如国内学者朱正、田刚及日本学者长堀祐造等。

[18] 赵歌东:《关于“两个口号”论争的两个问题》,《东岳论丛》2016年第2期。

[21] 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第33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23]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50页,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

[25][26] 冯雪峰:《雪峰文集》第4卷,第237页,第2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29] 这些资料包括冯雪峰《有关一九三六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1979)、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1979)、茅盾《我走过的道路》(1981)、胡风《鲁迅先生》(1994)以及1992年披露的《党中央领导人给冯雪峰的函电》等。

[30] 该书1943年初版于重庆胜利出版社,1953年再版于香港亚洲出版社,1978年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出增订版。

[33]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1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41] 杨姿:《“同路人”之上——鲁迅后期思想、文学与托洛茨基研究》,第365页,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版。

[43][50] 孙郁:《鲁迅与俄国》,第303页,第33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

[44] 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第1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45] 长堀祐造自1996年开始陆续在中国大陆发表《试论鲁迅托洛茨基观的转变——鲁迅与瞿秋白》等多篇论文,又于2015年在台湾人间出版社出版《鲁迅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在中国》一书。后来赵歌东、田刚、杨姿等人的研究应该都受到过长堀祐造的启发。

[49]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2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1] 古远清:《鲁迅在香港载沉载浮的历程》,《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7期。

[作者单位: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高华鑫